

语言视域下的丝路文化变迁

赵江民¹ 符冬梅²

(1.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2. 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本文以新疆考古发现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文献释读为基础, 论述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历史。丝绸之路民族文化的变迁主要由语言和文字来体现, 其支配力量是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宗教。丝路民族文化的变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印欧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 其对应的时代分别为: 6 世纪以前、6—9 世纪、10 世纪以后。其中, 汉语和汉文化影响的长期持续存在自不待言。

(关键词) 丝绸之路; 文化影响; 语言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31-06

丝路, 亦称丝绸之路, 形成于公元前 3 世纪。丝绸之路上民族众多、语言各异, 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主要包括梵语、犍陀罗语、吐火罗语、斯基泰语、花拉子模语、于阗-塞种语、哒哒语、安息语、波斯语、匈奴语、蒙古语、满洲语、回鹘语、喀喇汗语、汉语、藏语、唐古特语、西夏语以及闪米特语族的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记录上述语言的书写系统主要是阿拉伯文、阿拉米文、婆罗密文、中文、埃斯特兰吉洛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哒哒文、契丹文、卢虱底文、拉丁文、摩尼文和八思巴文, 还有突厥如尼文以及至少两个变种文字: 粟特文和藏文。^[1]

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关键, 其他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以语言为基础。^[2] 换言之, 语言是文化的传承工具和形式代码, 是文化的体现。因此, 语言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的变迁。以下我们将以语言和文字的更替为着眼点, 来考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

一、印欧文化

(一) 印欧文化的萌芽(公元前 4—1 纪元开始)

发源于黑海北岸地区的古代印欧人向文明地区发起过三次大的迁徙。^[3]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2000—前 1800 年, 一支从中亚草原向南迁徙的印欧人进入了丝路南北道的绿洲地区, 其可能是后来的塞人、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第二次是在公元前 1200—前 1000 年, 吐火罗人也进入了丝路南北道的交汇地区。第三次是在公元前 334—320 年左右, 希腊君主亚历山大东征, 引起大批伊兰人进入丝路绿洲。此后印欧文化开始在丝路萌芽。

印欧文化萌芽的典型标志就是古波斯语、帝国阿拉美语、古巴克特利亚语、塞语等在丝路西段——中亚地区开始流行, 阿拉美文、古波斯文、古巴克特利亚文、佉卢文、希腊文、塞文等

(收稿日期) 2013-09-10

(作者简介) 赵江民(1970—), 男, 山东莱州人,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符冬梅(1976—),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规律及其在双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11BY1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献的陆续出现。上述语言大多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支，多为印欧人的后裔在丝路西段所使用。^[4]其中的遗存有阿拉美铭文6处，巴克特利亚铭文5—6处，佉卢文陶片、钱币、石刻铭文若干件，希腊文碑铭、陶片、银器铭文数量也不少。塞人文献主要是佉卢文和婆罗密文石刻。这一时期的伊朗语支文献的特点，可以基本概括为行数少、内容简单、形式单一、流布地区较为集中等，例如坎大哈石刻、艾哈农阿拉美陶片等。

（二）印欧文化的发展（公元1—6世纪）

公元1世纪前后，在丝路南北道及其周围，由印欧人种部族形成的城邦之国的居民主要是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以及月氏人的遗种或流民等。印欧文化发展的显著表现是丝路南北道印欧语族文献的大量出现、印欧语族语言对丝路语言的影响、印欧语族语言对宗教的传播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等。

1. 印欧语族文献的大量出现

丝路出土的吐火罗文献主要有：西格和西格凌刊布的《吐火罗语残卷·A/B方言》，其中包含若干佛经、佛教故事，诵佛诗歌等；托马森刊布的《吐火罗语残卷·B方言》，其中包括《法句经》、佛本生故事、情书等；新疆博物馆所藏《弥勒会见记》等。除残卷外，还有一些吐火罗粗刻和碑铭。楼兰所发现的佉卢文文献其内容多为世俗文书，主要包括国王敕谕、公私信札、各种契券、簿籍帐历，多收录在《斯坦因在中国新疆所发现的佉卢文字集录》中，共收763件。现存粟特文文献主要有宗教文献、社会经济文书、钱文、印章、碑刻、壁画题记、书简等，重要的文献有粟特古信、《大般涅槃经》、《佛说善恶因果经》等佛教文献以及景教、摩尼教文献《巨人书》、《福音书》等。和阗塞语属于中古伊朗语，和阗塞语的大多数文献都是佛教文献，主要有《弥勒授记》、《妙法莲华经》、《阿弥陀赞》、《普贤行原赞》等。

2. 印欧语族语言对丝路语言的影响

从史前直到6世纪，印欧语系语言在丝路南北道都是地区优势语言，一些丝路地名以印欧语系语言来命名，用汉字来记音。例如于阗（Hvatana）就是塞人一部落名称的译音（尉迟），莎车是古代塞人（Saka）族称的汉字记音，龟兹（Kuci）一名是古代西吐火罗语 kutsi

（意为白）汉字音译，疏勒（Suylak）地名则属于东伊朗语支，是古代粟特语的一种方言对粟特人自己的称呼。由于佛经的翻译和汉语、印欧语系语言的接触，从而出现一种汉语变体——佛教汉语。蒋绍愚先生研究发现，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使得汉语有了完结与完成两种语义范畴的对立。^[5]汉语中的一些佛教词语，如沙门、沙弥、弥勒、佛等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

3. 印欧语族语言对宗教的传播

印欧语族语言对宗教传播的影响，可以从祆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传播中窥见一斑。据贝利等人研究，丝路诸国在接受佛教之前曾经信仰过祆教。^[6]祆教借助粟特语，并在伊兰商人的影响下，在丝路居民中逐渐传播开来。佛教于公元前186—公元前176年之间传入于阗，其凭借的传播工具主要亦是这些印欧语言。斯坦因就认为：和田和尼雅一带的佉卢文字的出现是与佛教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7]源于波斯的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创立后，就派出末冒向东方传教。依靠粟特摩尼文，摩尼教最迟于公元6世纪传播到丝路南北道。^[8]中古时期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景教从公元431年后从君士坦丁堡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其主要承担者是粟特人，使用的工具是粟特语的叙利亚文或古叙利亚语。

4. 犍陀罗佛教艺术

丝路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壁画和舞蹈。植根于希腊艺术的大夏、贵霜王朝的壁画在佛教诞生前就已传到丝路南北道。尼雅就曾出土手持丰裕羊角的希腊女神狄刻。伴随佛教进入龟兹的石窟壁画分为三种时期的风格：公元500—600年，系印度—伊兰风格，印度成分占优势；公元600—700年，系印度和伊兰成分交织在一起；最后是中国—回鹘风格。^[9]由希腊艺术和佛教艺术结合产生的犍陀罗艺术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米兰壁画的内容虽是佛教内容，但从风格上来看，却显示出印度、希腊成分，甚至有伊兰和地中海成分。

二、突厥文化

（一）突厥文化的萌芽（公元6—8世纪）

6世纪以后，丝路南北道的印欧文化影响有

所衰减。造成这一情形的直接原因是伊兰人的本土化、中原影响的深入以及突厥文化的萌芽。

1. 伊兰人的本土化

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波斯萨珊王朝的灭亡,原本居于丝路西段信仰摩尼教、拜火教的伊兰(粟特)人为了避乱而进入丝路南北道。《沙州伊州地志》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755—763年爆发安史之乱,许多粟特人惧怕牵连而改头换面,与当地土著人通婚,或融入当地民族。^[10]

2. 中原影响的深入

498年,汉族人鞠嘉在原操吐火罗A方言的车师建立鞠氏王朝。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王国在汉胡兼容中,积极传播汉文化,直接影响丝路南北道居民的物质生活方式。据《周书·异域传》:(龟兹)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耆略同……^[11](焉耆)婚姻之礼有同华夏。龟兹历法也是沿革了中原历法后发展和变通的。佛教入唐以后又大规模逆向传于丝路南北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流布。这种文化反哺表现在石窟壁画内容和佛经翻译上。库木吐拉千佛洞就是汉人开凿、汉僧主持的,其经变画不同于西域本生画。于阗出身的提云般若、实叉难陀、智严、尸罗达摩等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

3. 突厥文化的萌芽

突厥文化萌芽的典范代表就是突厥如尼文的创制、古代突厥文文献的出现和粟特人对古代突厥文的传播等。

古突厥文文献使用类似北欧如尼文的字体,称作突厥如尼文。关于其来源,一是来源于印欧语系语言;一是来自自身的发展。牛汝极、阿力肯否认突厥如尼文的阿拉美-粟特起源说,认为其有独特的创制体系。^[12]根据匈奴人墓葬发掘物中的20多个雕刻文字,并考察粟特文字的传播过程,后者更令人信服。不可否认,突厥如尼文中还是有一些字母在形式上受到粟特字母的影响,是时当为3世纪后期,摩尼派弟子阿莫到中亚传教过程中使用的是帕提亚语、帕提亚文。也正是阿莫才将这种语言作为中亚摩尼教的正式用语。这种将本族图画文字与粟特字母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是对印欧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借

助印欧文字语言传播突厥文化。^[13]

丝路古代突厥文文献主要集中在丝路西段的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盆地,载体多为石碑、器皿、崖壁、木杵等。属七河流域的有墓石、钱币、日用品和木棒上的铭文;属费尔干纳地区的有陶器和金属器皿上的若干短小铭文。在穆格山文档中还发现了写在皮革上的文书。此外在吐鲁番亚尔和屯、吐裕沟、火焰山公社、米兰戍堡等处也发现了一些8世纪左右的古代突厥文文献。

从公元前2世纪到唐朝末年,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占支配地位。自默啜可汗西征至撒马尔罕之后,粟特人敏锐地意识到漠北地区的重要性。一是可以利用其作为丝路贸易的保护带;二是利用其与唐朝绢马贸易而牟利。因此,使用突厥语、如尼文就成为语言天才——粟特人的不二选择。从汉文史籍和古代突厥文文献来看,粟特人在漠北地区经商从政的不在少数。《资治通鉴》卷184载: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特别是突厥可汗,往往多信任粟特人。^[14]《资治通鉴》卷192载: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15]在与突厥人经商共事的时候,粟特人必然会使用突厥语。惯于在丝路上行商的粟特人,进而将突厥文化传布到西域各地。

(二) 突厥文化的发展(公元8—10世纪)

8—10世纪是突厥文化(包括回鹘文化)在丝路南北道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在:丝路南北道地方政权的突厥化、回鹘文文献的大量创制、回鹘文对宗教传播的促进和突厥一回鹘文化的推广等。

1. 丝路南北道地方政权的突厥化

744年,漠北回鹘汗国建立。它完全继承后突厥汗国的政权和疆土,也不遗余力地向西拓展。9世纪上半叶,在丝路上已经有了若干回鹘的统辖地区。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的一支回鹘迁到别失八里、高昌及葛逻禄人居住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852年,其中部分回鹘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其势力一直延伸到焉耆、库车一带。西走葛逻禄的部分回鹘促进了丝路南道的突厥化。建立喀喇汗王朝的部分回鹘人早在9世纪末已占领喀什葛尔。可以说,丝路南北道的突厥化正是北道回鹘政权和南道葛逻禄人定居化的结果。

2. 回鹘文文献的大量创制

从漠北回鹘汗国的古代突厥文碑铭来看,突厥如尼文—粟特文双语文献已出现。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不久,就用回鹘文逐步取代古代突厥文。回鹘文来源于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而后者又来自阿拉美文。突厥人和回鹘人在与粟特人的交往中逐渐采用了这种文字。属于10世纪左右的回鹘文文献,大多属于佛教文献。其他多数的社会经济文书、书信、历史文献以及密宗文献等应当属于10世纪以后。现存的主要回鹘佛教文献有《阿含经》、《诸方平安经》、《十业道譬喻鬘》、《俱舍论》、《妙法莲华经》、《八阳神咒经》等。

3. 回鹘文对宗教传播的促进

丝路突厥化的形成,使得回鹘—突厥语逐渐战胜了当地的印欧语系语言,成为通用语。随之而来的就是回鹘—突厥语成为丝路宗教传播的主要工具。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从梵文和当地的焉耆语、库车语、特别是从汉文中翻译了许多佛经。自8世纪后半叶回鹘改宗摩尼教后,摩尼教就成为回鹘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许多摩尼教文献都是用摩尼文和回鹘文写就的。例如《摩尼教赞美词》、《沙卜拉干》译文残卷、《摩尼教寺院文书》、《摩尼教徒书信》等。景教的传播基本是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因此,丝路南北道诸城邦大都有景教信仰。高昌回鹘亦接受景教,并用回鹘文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景教文献。这些文献保留在德国科学院的就有50余件,如《圣乔治殉难记》、《回鹘基督徒婚礼上的颂词》等。^[16]

4. 突厥—回鹘文化的推广

回鹘迁居丝路要道高昌后,继承和发展了当地存在已久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儒学文化,创造出辉煌的回鹘文化。而以高昌为中心的突厥—回鹘文化圈,也对丝路南北道的文化产生影响。由于西迁的回鹘人不论是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优势,突厥—回鹘语逐渐成为丝路南北道的通用语言。原著居民的印欧语系语言也给突厥—回鹘语以某种程度的影响,进而成为底层语言。由于底层语言是印欧语系语言,客观上促进了突厥文化的流布。同样,突厥文化的影响也产生在丝路西段,粟特语、花拉子模语等伊兰语逐渐为突厥—回鹘语所取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

的通行,势必会导致文化的跨界传播,从而扩大文化的影响。

三、伊斯兰文化

(一) 伊斯兰文化的萌芽(公元10—14世纪)

伊斯兰文化在丝路南道的萌芽始于10世纪左右,它是伴随丝路西线的伊斯兰化、佛国湮没和佛教没落,以及花拉子模文化的影响而进行的。

705—715年,阿拉伯先后征服了丝路西段的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布哈拉、撒马尔罕,接着进军锡尔河流域。751年在塔拉斯河畔打败唐朝军队,从而为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打开了大门。阿拉伯人对帕米尔以西绿洲的统治极大地推进了当地的伊斯兰化,9世纪在那里建立的萨曼尼王朝已是纯粹的伊斯兰教王朝。最迟10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就已经伊斯兰化。从11世纪史学家阿卜达勒·加菲尔的著作《喀什史》中可知:喀喇汗王朝萨吐克·布格拉汗首先率领其人民接受伊斯兰教。^[17]萨吐克·布格拉汗之子木萨对巴拉沙衮发动宗教战争,并取得胜利,从而使丝路南道开始伊斯兰化。11世纪,信仰佛教的于阗(和田)王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灭亡,当地的居民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以喀什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使用哈卡尼亚语(或曰喀什语或王朝语言)。伊布拉欣·穆提义认为:回鹘语和哈卡尼亚语的区别只是由于用这两种语言所写成的书面文献反映的文化不同(回鹘语书面文献主要反映在佛教、摩尼教环境中创造的文化,哈卡尼亚语反映在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的文化)。^[18]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文献是用哈卡尼亚语写就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尤素甫·巴拉萨衮的长诗《福乐智慧》。此外还有尤格纳基的劝诫诗《真理的入门》等。金帐汗国虽然只是在丝路西段的南部地区,但是其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献对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文献有阿布·海严的《智慧的礼品》、库特普的《胡斯劳与席琳》、花拉子米的《爱情书》、塞非·萨莱依的《蔷薇园》等。

(二) 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公元 15—19 世纪)

伊斯兰文化在丝路南道的深入、在北道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渐进东传、察合台语的形成和察合台文献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1347 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帖木儿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其所属 16 万蒙古人变成了穆斯林,此举为后来伊斯兰教最终在丝路南北道占据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后,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马黑麻等汗相继发兵东征,多次向吐鲁番、哈密等地发动宗教战争,大大地加快了丝路北道的伊斯兰化进程。1473 年东察合台汗国的羽努斯汗发兵攻占哈密。至 16 世纪,伊斯兰教在丝路南北道诸地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察合台语是伊斯兰中亚突厥语文字语言发展的第三阶段,形成于帖木儿王朝时期(1405—1502 年)。这种语言作为中亚广大地区突厥人的书面语一直使用到 19 世纪末期。它是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下,从哈卡尼亚语演变而成的,主要采用阿拉伯文的 28 个字母,并从波斯文借用了 4 个字母。此外还采用了阿拉伯文的若干元音、辅音字母以及其他辅助符号。从回鹘语到哈卡尼亚语,再到察合台语,其语法结构差异不

大。主要差异在于文化词和借词。据统计,察合台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一度达到 50—60%。^[19]

察合台文献是指用察合台书面语写成的文献,它主要流行于丝路西段和丝路北道。15 世纪是察合台文献中的古典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文学作品不仅包含伊斯兰波斯文学所有的诗歌形式,还包括突厥诗歌特有的形式。代表作品有:萨卡基和鲁特菲的《诗集》、纳瓦伊的诗集《五部书》、《心之所爱》等。16 世纪的察合台文献主要有昔班尼的《诗集》、哈衣达尔的《拉什德史》、巴布尔的《巴布尔回忆录》。后者可称为中亚文化的宝库。17、18 世纪,丝路南北道的察合台文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尼扎里的《不幸人的故事》、沙伊尔阿甫的《伊斯兰之书》、穆哈迈德·萨迪克的《和卓传》等。

以上所述是以新疆考古发现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文献释读为基础,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从印欧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三个方面回顾了丝路文化变迁的概貌,阐释了丝路民族文化变迁的主旋律主要由语言和文字来体现,其支配力量是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宗教。

(参 考 文 献)

- [1] Edward Tryarski. The Geographic and Linguistic Status of the Silk Roads [J]. DIOGENES, 1995. 171.
- [2]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68.
- [3] 蓝琪.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M].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24.
- [4] 哈尔玛塔. 突厥和突厥汗国 [J]. 东方学杂志, 1967, (2). 32
- [5]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63.
- [6]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M]. LONDON: PERCY LUND, HUMPHRIES, 1968. 74.
- [7] 斯坦因. 古代和田 [M]. 巫新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59.
- [8] 芮传明. 唐代摩尼教传播过程辨析 [J]. 史林, 1998, (3): 20.
- [9] 瓦尔施密特. 古代新疆的佛教遗迹 [M]. 威斯巴登, 1953. 140.
- [10] 郑炳林. 《沙州伊州地志》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J]. 敦煌学辑刊, 1986, (2): 68.
- [11] [唐] 令狐德棻. 周书·异域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86.
- [12]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文献导论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237.
- [13] 洪勇明. 漠北回纥汗国碑铭考释 [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85.
- [14]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18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740.
- [15]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19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037.
- [16] 宗德曼. 吐鲁番文献所见摩尼的印度之旅 [J]. 杨富学译. 敦煌学辑刊, 1994, (2): 132.
- [17] 蒲立本. 喀喇汗王朝 [J]. 东方学杂志, 1956, (4): 30—32.

〔18〕依不拉音穆提义. 论察合台语 [J]. 新疆大学学报 (维文) , 1986 , (3) : 25

〔19〕叶少钧. 浅谈维吾尔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问题 [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0 , (2) : 26

Cultural Changes on th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ZHAO Jiang-min¹ , FU Dong-mei²

(1. College of Languages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Xinjiang Ethnic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
Urumqi , Xinjiang 830054;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Urumqi ,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ancient books on Xinjiang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readings of those books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ound cultural changes on the Silk Road which are embodied chiefly by language and writing , and dominated by culture and religion reflected in ethnic languages. The changes of the Silk Road 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do-European culture , Turkic culture and Islamic culture , with temporal division before the 6th century , from the 6th to the 9th century and after the 10th century. In the whole process , the long-existing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self-evident.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cultural influence; chang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责任编辑 李红雨)